應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楊孫西　原全國政協常委

不久前，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蒞臨香港視察，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習主席提出「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的要求，冀加強兩地合作，推動香港發展。在新一屆特區政府領導下，謀發展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旋律。令人遺憾的是，近來校園播「獨」事件，挑戰「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破壞了香港的發展環境。教育界普遍認為，大學校園內雖有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有底線，不可侮辱他人及作出違法行為。「港獨」活動的存在，不僅嚴重危害國家的主權、安全，亦嚴重影響香港社會繼續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及穩定的社會。

習主席在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再次回顧了香港的百年滄桑巨變，並且提出不斷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習主席精闢地概括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年取得的成績、存在的問題和今後的努力方向。落實習主席提出的「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的重要指示，就要以實際行動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支持「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等國家戰略，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行穩致遠。

落實習主席香江之行的要求

習主席多次強調，中國正處於距離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最接近的時刻，即將舉行的中共十九大將總結成功經驗，領導中國人民為實現中國夢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小康決戰決勝，並為本世紀中葉實現全面現代化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打好基礎。毋庸諱言，只要社會各界聚焦習主席視察香港時提出的要求，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齊心協力，奮發圖強，就一定能再譜香港新篇章，再創新輝煌！

習主席指出，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溝通，凝聚共識，才能逐步解決問題。從中央來說，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我們都願意與之溝通。

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有着許多有利發展條件和獨特競爭優勢。特別是這些年國家的持續快速發展為香港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不竭動力、廣闊空間。事實上，對於香港的發展，中央一直高度重視。如香港產業發展、青年前景問題、落實「一地兩檢」、參與大灣區、「一帶一路」建設等問題，都是關注和正在規劃中的問題。據報道，中央將大力推動祖國內地與港澳的交流合作，為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和衷共濟、凝心聚力，促進社會和諧，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依法反「港獨」維護國家主權

兩個多月前，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時就嚴正指出，「一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習主席強調，要注重教育、加強引導，着力加強對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關心、支持、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

教育界人士建議，在今後長時間內，可以持續性地組織內地或者香港專家學者，在香港各大高校定期舉行學術會議、論壇等活動，進行理性討論，逐漸形成固定機制，衝擊和淡化部分崇尚西方價值的學者、教師在青年學生中的單一影響，形成一股反思和批判「港獨」激進思想、激進言論以及西方價值理念的氛圍。總之，要耐心傾聽青年人的心聲，通過對話解開心結，學校的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全社會亦應關心香港青少年的成長！

香港未來成功發展的兩個關鍵

張定淮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十九大前瞻

對於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即將召開，香港社會予以極大關注。關注者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具理性的絕大多數港人，他們看到了作為法定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非凡成就，對於中共十九大抱有重大期望。因為其確定的方針政策，發展戰略和發展目標不僅與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也與世界未來的發展密切相連。作為領導近14億之眾的超大型國家的執政黨盛會，他們為之歡呼。其二是少數對中共抱有成見的人士，他們也在窺視中共十九大會對香港有何新的政策動向。

四個標誌象徵「一國兩制」成功

「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其基本政治目標是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以極大包容來保留地方區域的資本主義制度，使其繼續保持繁榮穩定，並發揮國家主體內部其他地方區域所不能發揮的作用。中國的這種做法不僅受到了全世界的讚譽，且被認為開創了以政治方式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新思路。

香港回歸20年，「一國兩制」運作良好。四個標誌性的內容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其一，通過「一國兩制」政策的實施，中國向着國家完全統一的目標邁出了一大步，中央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其二，體現國家主權意志的各種制度安排在香港得以建立，其在運作中雖出現過一些小問題，但總體而論，運行良好；其三，香港回歸後，繼續保持了繁榮穩定；其四，香港自由社會的特徵和港人習慣的生活方式沒有變。

「一國兩制」的寬鬆與香港自由社會的特性的保留的事實全世界有目共睹，這也使香港社會呈現出紛繁複雜的景象，有人就是利用這種環境不斷做出違背政治底線，超越法律規範的舉動。對此，中央發出了嚴厲的警告。因此，香港社會就有人對「一國兩制」前景胡亂猜疑。

其實，我們只需看看習主席6月底7月初視察香港時所發表的系列講話內容以及習主席7月26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內容，我們就能清楚中共十九大後中央對港政策的基本思路。中共十九大，謀的是國家發展的大局，而香港只是一個局部，因此，指望十九大文件中作出對香港發展的具體規定是不可能的。

在筆者看來，中央對港方針政策是既定的，明確的。我們完全可以用這樣一段話描述：「沒有變，不會變，不能變」。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中央對港方針政策上，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鑒於香港現時的政治、法律地位，基於國家發展大戰略考量，中央會在對港政策執行上把握兩個關鍵點：

更加珍視法治原則

其一，香港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轄下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區域，必須在國家治理體系的整體框架內向前發展。董建華先生曾說過「國家好，香港好；香港好，國家更好」，這段話是符合整體國家治理的基本邏輯。有人想搞亂香港，這是不能容忍的。也有人以「高度自治」為由試圖使香港擺脫國家整體治理體系，這也是不能容忍的。在國家主體強勁發展的勢頭面前，中央想方設法使香港搭上國家快速發展的快車。有人可能會問「何故」？答案是：這符合整體國家利益。可喜的是，香港許多人士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正在出謀劃策探討如何使香港在「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大戰略中發揮獨特作用。

其二是更加珍視法治原則。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依法處理各種社會矛盾是絕大多數港人信服的方式。在「一國兩制」下，由於廣大港人享有基本法所賦予的各種自由權利，其對於法治對自由的限制也應該有起碼的認識。這對於遏制香港極端勢力干擾香港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有人可能會問，如果強調香港在國家治理體系的整體框架發展的重要性，香港的高度自治還能保障嗎？筆者認為，嚴格按基本法辦事是處理中央與特區關係最好方式。習主席在7月26日的重要講話中說道：「黨的十八大以來的5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很不平凡的5年。我們堅定不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顯著增強了我們黨運用法律手段領導和治理國家的能力。」由此可見，依法治港作為依法治國的成功經驗的一部分是中共十九大後所絕對不會放棄的方式，而這一點也是保障香港順利發展的關鍵。

■香港必須融入祖國發展，才能有更廣闊的前景。

警惕政客暗撐「港獨」的政治把戲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

正當大學校園「港獨」風波持續發酵之際，「末代港督」彭定康藉宣傳新書訪港，「例牌」地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這位過氣政客口裡說反對「港獨」主張，卻美化「港獨」者背後是「渴求『一國兩制』承諾」，甚至吹捧黃之鋒等人代表着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的價值云，顯然是有備而來，挑撥爭議。

近年「港獨」風潮無論在校園內外，早已逾越了「言論自由」或「學術研討」的界線。惟彭定康一邊說「港獨」是個壞主意，不贊成有關人等「硬碰硬」，一邊卻對「港獨」者表示理解，還反過來諉過中央政府應以行動「恢復」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云，根本是混淆視聽，欺哄港人。

此外，彭定康宣稱特首林鄭月娥應向中央表明爭取民主不是顛覆政權，又把煽動暴力抗爭的黃之鋒等人抬舉一番。說穿了，就是要把爭取民主與搞分裂混為一談，曲線鼓吹新一代繼續所謂的「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為「港獨」加一把力，唯恐香港不亂。

儘管有輿論指彭定康此行言論只是舊調重彈，加上香港已回歸20年，這位「末代港督」的影響力大不如前，但在當下一觸即發的政治氣候下，香港人仍要高度警惕政客玩弄政治把戲。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明言，香港實踐「一國兩制」遇到的問題中，包括少數激進分子公然散佈「港獨」及「香港自決」，並與境外政治勢力相勾結，嚴重威脅國家的統一和主權安全。我們有責任自覺捍衛「一國」，務實維護「兩制」，全面落實好基本法。

城巴慘劇訴說打工仔苦況

紀碩鳴

名家時評

城巴在深水埗劏上行人路，造成3死30傷，慘劇的背後是另一個悲慘故事。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的城巴車長，被揭事發當日及前一日一直駕車13小時，工作強度達到相關安全指引的最高警戒。雖然，相關情況並沒有違反運輸署指引規定的車長每日14小時工時上限，但通宵長時間駕駛身心俱疲卻是不爭的事實。

一項調查發現，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城市，每周平均工時超過50多小時，比全球的平均工時多38%。香港人的平均工作時間比孟買的43.78小時、墨西哥城的43.48小時、新德里的42.57小時都高。而全球工時最短的城市是法國的巴黎，平均工時為每周30小時。香港人平均工時幾乎是它的兩倍。

即使如此辛苦，香港人得到的回報並不樂觀。香港人多擠迫，全世界都知道，但到底有多擁擠？根據一個外國網站研究，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5平方米（161方呎），全世界最小而且20多年沒改善。

即使如此細小的住房面積，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仍然是遙不可及。美國相關機構的調查顯示，香港連續7年在「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中冠絕全球。根據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樓價中位數於去年第三季，升至556.1萬港元，惟家庭每年收入中位數卻在29.3萬港元，即供樓負擔比例高達18倍，成為全球置業最困難的地區。

沒有房的為追房，有了房又背上沉重的貸款。香港人工作時間長，背後的原因就是因為生活所迫。

美世諮詢公司（Mercer）6月公佈了全球最貴生活費城市（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Report 2016）排名，香港登上首位，其次是安哥拉首都盧安達及蘇黎世，上海排第7，而台北則排第43。

過氣政客彭定康有何資格說民主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過氣政客、末代港督彭定康藉他的新書發佈會機會，又來香港搞局，並對回歸後的特區指指點點，指手劃腳，「叫」特首林鄭月娥向中央表明爭取民主不是顛覆政權云云。記憶所及，這個過氣政客自香港回歸以來，已多次來香港活動。總之，每逢香港特區出現一些重大事故和爭論，這個過氣政客就藉詞來港。今次也不例外。事關近期「港獨」猖獗，以及法院對「佔中」違法分子進行依法檢控。一場空前的搞「港獨」與反「港獨」的鬥爭異常激烈。這個過氣政客千里迢迢從英國跑來香港當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有說是為反對派及「港獨」分子鼓氣，有說向港英餘孽及隱藏的司法系統人士進行獻計和「施壓」。

過氣政客大談民主，又說什麼爭取民主不是顛覆政權。然而這個過氣政客卻不知、或者是詐不知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香港華人革新協會（簡稱華革會）向港英政府提出建議，建議立法局及市政局兩個議會要有民選議員，代表市民反映意見（民意）。可是華革會的建議不但沒有得到港英當局的關注和回應，相反，政府視華革會提出的建議為顛覆港英政府管治的「罪名」，甚至將華革會的背景及負責人的有關資料包括家庭成員歷史作出重大調查，並將有關資料寫成政治檔案，存寄在英國政府內部。同時，自那時起，華革會便成為港英政府打壓的對象，一直至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華革會在英國存有檔案之發現，是在約十年前英國政府所公佈出來的，華革會之所以一直受到港英當局打壓及有檔案存放英倫，主要的就是華革會是第一個民間團體向港英當局提議要有民選議員進入立法局，作為民意代表。就此而已。擺在當下，當然不成問題和「罪狀」。但在港英管治下，卻成顛覆政權的罪名。何來民主？！

英國統治香港百多年，從來就沒有民主可言。華革會事件就是一個鐵錚錚的事例。上世紀50年代初發生「三一」事件，華革會時任主席莫應溎（莫華倫祖父）負責迎接廣東省慰問團來港慰問火災災民事件，莫應溎就被港英當局以莫須有罪名將其遞解出境。其最大原因，就是華革會在「三一」事件之前向港英當局提倡民選議席而遭港英當局懷恨在心，進行報復。何來民主？！

至於在香港即將回歸中國的最後幾年，港英當局將三級議會逐步推行所謂的民主選舉，並不出於自願，而是「迫」出來的，可以說是包藏禍心的。其目的和用意，就是利用立法局民選議員抗衡特區政府管治。當年彭定康上任不久，就提出了所謂「三違反」及「三腳凳」把戲，利用立法局來向中國政府抗衡，說什麼中英兩國達成的有關協議，必須要得到香港立法局通過才有效云云。這就是港英當局臨走時草草推行所謂的民主和民主選舉的最大禍心。

說到民主，香港回歸後的民主及程度遠超港英管治香港百多年不知多少倍。各級議會議員都全是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也是由市民選出來的1,200名選委投票出來的。不似回歸前港督由英女王委任，由不得港人接受不接受。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過氣政客無論怎樣攪局，最後還是注定失敗的。

標普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不合時宜

張敬偉

評級機構標普日前降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理由是中國信貸增長可能帶來金融風險。在此之前，評級機構穆迪也曾降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

標普再次降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嚴重不合時宜。

首先，以單純的信貸增長和金融風險掛鈎，不合時宜也缺乏邏輯支撐。高信貸不一定出現高風險，除了看信貸總量還要看信貸品質。簡言之，信貸總量高如果不會出現呆賬，反而凸顯經濟活力。信貸總量較少，但是出現違約，也會導致金融風險。

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強化金融監管，尤其是加大了對「殭屍企業」的治理，抑制住了流向「殭屍企業」的信貸資金。此外，央行數據顯示，8月末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餘額佔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68.2%，同比高0.5個百分點。信貸增量更多流向實體經濟，凸顯宏觀經濟更為健康。因而，標普以信貸增長帶來金融風險的「可能」，作為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理由，站不住腳。

其次，標普在稱讚中國政府改革、增長前景和外部流動性的同時，調降中國主權信用，顯然是自相矛盾。而且，標普也認為中國貨幣政策整體可信與有效，強調未來三至四年，中國將維持其強勁的經濟表現並獲得改善的財政表現。一面說中國好，另一方面又降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這凸顯標普對華的「矛盾立場」。這一立場難免讓人聯想到對中國市場的偏見和對中國經濟的西方式立場。

還有就是，標普還將中國人均收入較低作為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理由，同樣不能令人信服。中國人均收入低是因為龐大的人口基數作為分母，但是中國的人均收入在逐年提升。數據顯示，中國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持續跑贏了GDP增速，今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2,932元，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8.8%。而且按照購買力計算，中國人均收入處於全球前列。標普以上升期的人均收入作為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理由，難以服眾。

更要者，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為6.9%，高於去年平均。這一成績的取得，是在中國深化供給側改革的前提下取得的，可以說中國經濟實現了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放眼全球，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長堪稱一枝獨秀。對此，中國政府謹慎或者說謙遜地稱之為「中高速增長」，這個增長速度在全球已經很難得。